

清华大学文化素质教育丛书

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

彭林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1c 870-4
P43

(京)新登字 158 号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邮编 100084

<http://www.tup.tsinghua.edu.cn>

书 名 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
作 者 彭 林 著
印 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发 行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 \times 1168 \frac{1}{32}$ 印张 7.625 彩插 2 字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302-05502-5/K · 19
印 数 0001~3000

定 价 13.00 元

总 序

子曰：“君子不器。”

每一位不甘沦为工具的青年，都应该打开狭小的专业“囚笼”，究天人之际，探心灵宇宙，悟时代真理，会文理一身，使自己成为行走于天地之间大写的人。

走进清华和准备走进清华的青年，在这所历史悠久的名校里，除了要掌握服务社会、实现自我的一技之长外，还应该返回孔子、返回柏拉图，从几千年的文化经典中寻找自己安身立命的精神支点，这样才能在未来的社会里，真正地做到经世济民、兴业安邦。清华大学于1997年正式颁布了《清华大学学生应读书目》（人文部分），陆续开设了200余门人文与社会科学课，要求每一位理工科的学生至少修习1/4的文科课程。如今，攻读人文经典，同古今中外的大师交流对话，已经在清华校园里蔚然成风。

强化文化素质教育，是一项伟大的变革，它势必提升清华的世界地位，影响中国的未来。

今日之清华，不仅是“理工重镇”，而且是“人文日新”。校内外

名师学者,在这里设坛授课,论究学理。本套丛书从中遴选精品公诸于世,希望有更多的青年获益并使这套丛书在公众的批评下日臻完善。

张岂之 徐葆耕

2002年2月2日于清华园

自序

本书是我在清华大学为本科生开的选修课的教材。这门课以“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为名，经历了很长时间的酝酿。

中国考古学，是 20 世纪初诞生的新兴学科，但却是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发展最快、成就最为辉煌的领域之一。无数沉睡千年，乃至万年的古代遗址、遗物，如同被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我们对于中华文明的认识，由此而不断被刷新。

文物是文化的载体，是一种物化了的文化。一件有价值的文物，必然凝聚着古人的审美情趣、工艺技术、行为方式、思维特点等内涵。然而文物是无声的，需要学者去发掘和解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某项考古发掘的结束，只是完成了一半的任务，当然，这是最基本的任务；另一半工作是要解读文物所包含的信息。如果没有后一半的工作，文物的价值就不能充分体现。例如，著名的曾侯乙编钟，如果没有古文字学家对铭文的成功释读，没有音乐史家对铭文所记乐律的深入研究，曾侯乙编钟的价值就难以真正为世人所认识。

不无遗憾的是,这些研究成果,通常是用相当专业的语言撰写的,一般读者难以卒读,而且都是在相当专门的刊物上发表的,专业之外的读者也难以见到。例如,曾侯乙墓出土的一件五弦器,经过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前所长黄翔鹏教授的缜密研究,确认为《国语·周语》记载的均钟,也就是编钟的音准器。这一发现,对于认识曾侯乙编钟的乐律体系,有着重大的贡献,可谓凿破鸿蒙,他的精深的功力和卓越的识见令人惊叹!可惜的是,黄先生的研究,鲜为音乐史界之外的人所知。

我之所以开设“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的课程,正是出于以上的感慨。我希望通过本课的讲授达到以下两个目的:

一是充当考古学家、文物研究专家与大学生和普通读者之间的桥梁。我试图将考古学家和文物研究专家的高头讲章,转换成普通读者能够听懂的语言,把专家们的重要研究成果变成大众的常识。希望听过本课的同学,或者读过本书的读者朋友,能对文物研究的一些重要成果有更加深刻的了解,由此而对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比较直观的印象,对“文化中国”的含义有更为透彻的认识。

二是希望通过本课,在学生中提倡学科交叉的思想。学术原本是一个整体,但是迄今所见的学科划分的态势,却是越来越细,其结果是人们的视野越来越窄。实际上,学术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学科的联合。即便是一件文物的研究,也会涉及到广泛的学科知识。文物研究的重要突破,每每得力于学科交叉的力量。这一现象,昭示了未来世纪的学科发展方向。希望学生能从本课得到启发,多多关注其他学科的研究状况。

本教材选择的10件(组)文物,大多是足以改变我们对古代中国的固有认识的精品,将它们作为引子来介绍古代中国的文化,是鉴于它们的学术价值。本书内容涉及到古代农业、天文、音乐、纺

织、玉器、建筑等领域,远远超出了我的专业范围,在撰写的过程中深感力不从心。因而,尽管龟勉为之,但错误和粗疏之处仍是不可避免的。恳请专家和广大读者赐教。

彭 林

2002年4月4日于清华园

目 录

自序	V
第一讲 河姆渡骨耜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	1
第二讲 贾湖骨笛与中国古代七声音阶的起源	24
第三讲 河姆渡蚕纹杖饰与先秦服饰文化	46
第四讲 良渚“琮王”与中国史前时代的玉文化	69
第五讲 四羊方尊与长江流域的商代文明	91
第六讲 妇好偶方彝与青铜时代的礼乐文化	117
第七讲 曾侯乙墓漆箱盖天文图与二十八宿的起源	140
第八讲 曾侯乙墓均钟与中国古代的律吕	161
第九讲 越王勾践剑与吴越地区的冶铸技术	181
第十讲 《周易》、《周礼》与故宫、北京城	204
后记	229

第一讲



河姆渡骨耜与

中国古代农业文明

骨耜,1977年第二次发掘河姆渡遗址时在第四文化层出土,是用牛肩胛骨制作的翻土工具,耜长18厘米,刃宽9.8厘米,上部厚4.2厘米,宽5厘米。出土时上部有藤条捆缚住一截断残的木柄。

农业是人类文明之母,是人类一切文明中最古老的文明。世界几大独立起源的文明,都是建立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之上的。由于栽培作物的发明,人类不再仰赖大自然的恩赐,走上了改造和征服自然的道路。农业文明最初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由于什么原因起源的?这是涉及到人类早期文明形成途径的重要课题,近一百多年来,国际学术界对此进行了艰苦的探索。

一、农业文明起源的几种学说

最早研究人类农业文明起源的主要是植物学家。1882年,瑞

士植物学家康多尔从生物进化的角度,结合作物的地理分布,比较系统地研究了野生植物与栽培作物的关系,提出了世界上有三个最早的植物驯化中心——西南亚埃及、热带美洲和中国的理论。1883年,康多尔《栽培作物的起源》出版,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1923—1931年,苏联科学家瓦洛维夫带领考察队前往亚洲、非洲和美洲各地,广泛收集植物标本。1935年,瓦洛维夫以大量实物和统计数据为基础,提出了新的作物起源中心的概念。瓦洛维夫认为,作物起源有八个中心:东亚、印度、中亚、近东、地中海、阿比西尼亚、中美洲和南美洲。其中的“东亚”,主要是指中国,是作物的第一起源中心之一,这里栽培作物的种类最为丰富,约占全世界栽培作物总数的20%。瓦洛维夫的理论影响很大。1971年,西方学者哈兰提出了栽培作物的中心和非中心的理论,中心是指作物的起源地,非中心是作物早期传入的地方。他认为中东、中国北部和中美洲是最早的三个农业中心。另有三个非中心,即非洲、东南亚和东印度群岛、南美洲。三个中心和三个非中心恰好成对称状态分布:中心在北、非中心在南。

人类最初将野生植物变为栽培作物的动机是什么?这是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英国学者柴尔德开始提出他的栽培作物起源的“干燥学说”。柴尔德认为,大约在1万年之前,在最近的一次冰川时代消逝之后,中东地区的气候发生了剧烈变化,生态环境的转换,使得动物数量锐减,当地居民原本以渔猎为生,面临食物来源匮乏的困境。迫于生计,他们开始驯化野生的禾本科种子植物,培育出了最早的小麦和大麦,形成了原始农业。到50年代,柴尔德将他的理论进一步完善,并公开发表,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随着田野考古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原始农业遗存在世界各地被发现,栽培作物的标本和农具不断出土。农业起源的讨论进入了全新的境地,人们不再仅仅依据现存农作物的分布状况来推断

栽培作物的原生地,而是必须依据考古实物资料下断语。任何关于作物起源的说法,都必须经过考古学的检验,考古学家成为了论坛的主角。

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农业的历史源远流长,早期农业的文献记载也极为丰富。黄帝是我国的人文初祖,《史记·五帝本纪》说他“时播百谷草木”,能顺应四时之宜播种百谷草木,说明农业文明已经出现。《尚书·尧典》记载,尧命羲和四子分居四方,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授民以农时。大禹治水,开九州,通九道,使在高山躲



图1 受黍年甲骨文

采自严文明著《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

避洪水的人民回到自己的土地上,从事农作。《史记·夏本纪》说,禹命令伯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禹将稻种分发给居住在低湿之地的庶民,则夏朝已经知道水稻的特性,并且推广种植。周人的始祖稷,好耕农,是尧的农师。黄帝、尧是传说时代的人物,文献中有关的记载是否可靠?农业是否发明于5000年前的黄帝、尧舜时代?中国的早期农业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中华文明崛起有过怎样的贡献?这一切,都需要用考古学的资料来回答[图1]。

二、磁山—裴李岗遗址:粟起源于黄河流域

从文献记载看,我国黄河流域种植粟的历史非常悠久。《史记·周本纪》说,武王克商后,为了赈济贫弱,曾经“发钜桥之粟”,可见当时已有规模相当的粟仓。粟的野生种俗称“狗尾草”,先秦文献称为“莩”。曾有学者提出黄河流域是粟的驯化中心的说法,可惜没有出土实物作为佐证。20世纪50年代,考古工作者西安半坡仰韶文化的窖穴和陶罐中发现了粟的朽壳,人们才确信中国史前时期确实已经有了栽培粟。

1976—1978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北武安县的磁山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据碳十四测年,遗址的年代为公元前6050—前5490年,距今约8000年。磁山一、二两期遗址中,共发现灰坑476个,其中88个是窖穴,形状为长方形,内有大量已经腐朽的粮食,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用灰像法鉴定,以及对残存外壳的观察,确认是粟的遗迹。^①这是中国粟出土年代最早的实物。据统计,窖穴中粟的厚度为0.5~0.6米的有40多个,约占60%;厚度在1米以上的有20个,占25%;2米以上的有10余个,约占

^① 安志敏:《磁山遗址的原始农业——试论中原新石器文化的渊源及发展》,载《考古》,1979(4)。

15%。粮食在窖穴内埋藏了 8000 多年之后,体积已经大大紧缩,有学者推测,当初粮食的体积当有 109 立方米,约重 69100 公斤。粟的大量储存,表明磁山人的农业已有了相当大的规模。

在磁山遗址中,发现了石斧、石铲、石刀、石镰等农具,其中的石磨盘、石磨棒,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形制规整,十分引人注目,成为磁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1977 年,磁山遗址出土的一件石磨盘与磨棒,用砂岩制作,盘面呈长椭圆形,前端较尖,后端平缓,下底有四个扁棱形矮足,磨盘高 8.8 厘米,长 57.2 厘米,宽 20.9 厘米,磨棒长 14 厘米,径 5 厘米。密集的粮食窖穴,可能是氏族组织的公共窖穴区。成系列的农具伴随出土,表明此时已经不是农业起源的初始阶段,其栽培粟发生的年代应当更为遥远。作为农业经济的补充,狩猎和采集经济也占有一定比重,家畜饲养业也比较兴盛,猪、狗等家畜的骨骸都有出土。

与磁山文化年代和性质相当的是裴李岗文化。裴李岗遗址位于河南新郑县城西北约 8 公里的裴李岗村西,面积约 2 万平方米。从 1977 年到 1979 年,先后进行了 4 次发掘,揭露面积达 2700 多平方米。发掘墓葬 114 座、陶窑 1 座、灰坑 10 多个,以及几处穴居房基。出土器物 400 多件,其中石器有石铲、石斧、石镰、石磨盘、石磨棒等;陶器有壶、钵、罐、碗、勺、鼎等;骨器有骨针、骨锥;还有陶纺轮、陶塑猪头、羊头等,以及弹丸、酸枣核、核桃等。裴李岗遗址的年代,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碳十四实验测定,距今约 8000 年,比仰韶文化要早 1000 多年。

裴李岗遗址尚未发现像磁山遗址那样埋藏粮食的窖穴,但在一些房基的周围发现了有一些炭化腐朽了的粟粒。由于裴李岗遗址出土了大批农具,我们可以推测它有着与磁山文化相近的农业文明。裴李岗文化的典型农具也是石磨盘、石磨棒,形制与磁山文化出土的基本相似。1978 年,裴李岗遗址出土一套石磨盘、石磨棒,盘长 68 厘米,前宽 37.5 厘米,高 6 厘米,棒长 58 厘米,用整块

砂岩琢制而成。磨盘呈鞋底形,正面坦平,底部凿有四个矮柱足。磨棒原本为圆柱体,因长期碾磨中部已经磨损内凹。1991年,河南扶沟县西店村北的黄土岗上发现一件石磨盘,长100厘米、宽32.5至44厘米,厚3.5厘米,通高8.5厘米,平面呈长椭圆形,也是用整块黄砂岩磨制而成,但没有使用痕迹。在目前已发表的139件裴李岗文化石磨盘中,是最大的一件。^①该遗址的器物有独特的文化面貌,石器以磨光为主,其中舌状刃石铲、锯齿刃石镰和石磨盘、磨棒都有显著特点。陶器多为红褐色,火候低,手制,器表多为素面,纹饰有蓖点纹、划纹、指甲纹等,器形以三足钵、小口双耳壶、三足壶、大口深腹罐等最有代表性。考古学界命名为“裴李岗文化”。目前在河南省范围内共发现裴李岗文化遗址约五十余处,主要集中在淮河上游各支流之间。

石磨盘与磨棒在磁山—裴李岗遗址普遍发现,往往是在墓葬中成套出土,二者配合使用,是脱去谷粒皮壳的工具。云南的独龙族和怒族的妇女至今还用石磨盘加工粮食。石磨盘的底部为什么要琢出柱状的足呢?根据民族学的资料,石磨盘使用时都不是放在地上,而是放在竹器内,有了柱足,石磨盘就不易滑动,而且使磨盘与竹器之间有一定空隙,不易被碾磨好的粮食埋没。

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在西起甘肃,东至辽宁的整个华北地区,普遍发现了公元前7000—前5000年的粟的遗存,有些遗址虽然没有发现谷物遗存,但出土了相应的农具。中国是粟的栽培中心,已经为国际学术界公认。考古发现表明,中国不仅是最早的栽培粟的国家之一,而且是世界上惟一的、最早从粟开始发展起来的农业国家。

史前时代黄河流域的农业文明如此辉煌,它是否向世界其

^① 郝万章、张桂云:《扶沟出土最大裴李岗石磨盘》,载《中国文物报》,1991年9月22日。

他地区传播过呢？从考古资料来看，它与美洲的某些古文明有若干相似之处。公元前 2000 年到公元前 250 年，是美洲的“前古典时期”，这一时期的早期，有两个代表性的拉丁美洲古文明，一是位于墨西哥湾沿海低地的奥尔美克（Olmeca）文明，二是在南美安第斯高原上的查文（Chavin）文明。秘鲁历史和考古学家利奥·特略通过对查文文化的长期研究，发现了额头带有“王”字的人头雕像。查文文化时期的石雕、石刻及陶器中有大量的蝙蝠图案，而蝙蝠是中国传统的吉祥物。查文文化遗址中还有雕刻精细的石笔筒，鸳鸯笔筒，以及石龟、数以百计的石雕人像，雕刻风格与中国同类作品类似。最令人惊奇的是，查文文化时期发现的一套石磨盘和石磨棒，形状与磁山—裴李岗出土的完全一致。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认为，这是 1—2 万年前中国文明向美洲传播时带去的。

三、石破天惊河姆渡

水稻是人类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水稻的种属，可以分为非洲稻系和亚洲稻系两大类。非洲稻系起源于尼日利亚，学术界没有太大的分歧。而亚洲稻系最早发源于何地，学术界的分歧非常大。

1883 年，瑞士植物学家康多尔在他的《栽培作物的起源》中，提出中国是栽培稻的起源中心的看法。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植物学家瓦维洛夫最早提出，印度是稻米的起源地，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是次级栽培区，并说中国稻作是从印度传入的。^① 瓦维洛夫的理论影响很大，成为当时学术界的主流说法。

^① 严文明：《中国稻作的农业起源》，载《农业考古》，1982（1）。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中国、印度、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地普遍发现了史前时代的栽培稻遗存,有关稻作起源地的争论日趋热烈,意见纷纭,有印度阿萨姆邦起源说、阿萨姆·云南起源说、喜马拉雅山麓“带状”起源说、泰国或东南亚起源说、锡金·大吉岭起源说等,不一而足。

有些学者通过对稻谷遗存、考古学、地理学以及古气候学等的综合研究,提出了稻作多中心起源说的理论。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中心的张德慈教授认为稻作起源可以有多个中心。^①著名学者何炳棣教授也主张多中心论,他说:“稻谷大概是在中国南方、东南亚和印度次大陆独立驯化的。”^②

1973 年,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江南小镇——河姆渡附近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出土大量古稻,使瓦维洛夫的理论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河姆渡遗址位于浙江余姚县河姆渡镇的浪墅桥村,发掘的面积达 2800 平方米,依遗址年代的早晚,可以分为两期。早期文化遗存距今约 6900 多年,文化内涵独特、丰富,被命名为“河姆渡文化”。

在先后进行的两次大规模的发掘中,第四文化层都发现了大量的栽培稻谷遗存,上层的堆积尤其丰富。在第一次发掘的 400 多平方米范围内,普遍发现一层或多层由稻谷、稻壳、芦苇茎叶等等混杂而成的堆积层,层层迭压,厚度不等,或 10~20 厘米,或 30~40 厘米,最厚处竟达 80 厘米。由于河姆渡遗址地势很低,而地下水位却比较高,使该文化层完全浸没在水中,与空气隔绝,稻谷保存状况相当完好,举世罕见。出土时,稻秆、稻叶和稻谷与秕谷壳色泽如新,外形完好,有的连稻谷颖壳上的隆脉、稃毛、芒尖仍清晰可辨,个别地方还出土有稻谷与茎叶连在一起的稻穗

① 张德慈:《水稻对人类文明和人口增长的影响》,载《农业考古》,1988(1)。

② 何炳棣:《中国农业的本土起源》,载《农业考古》1985(1)。

[图 2]。^① 有学者推测,堆积层的厚度原先当在 1 米以上;假定当时的平均厚度为 1 米,而其中的四分之一为稻谷和谷壳,则换算成稻谷的重量当在 120 吨以上。尽管这可能不是一年的产量,而是多年的堆积,但可以肯定,当时稻米的产量不仅可以满足河姆渡人的食用,而且有较多的剩余。有趣的是,在一件陶器上刻着一大束向两侧弯垂的稻穗,给人以稻实累累的丰收印象。此外,在一件陶釜内还发现了残留的锅巴,陶釜相当于后世的锅,表明河姆渡人已经将稻米作为主食。



图 2 河姆渡出土野生稻的显微结构及其与栽培稻的对比

采自严文明著《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

^① 林华东:《河姆渡文化的经济特点》,《河姆渡文化初探》第六章,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